

世纪文库

新工业国

[美]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著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新工业国

[美] 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著 嵇飞 译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工业国/(美)加尔布雷思(Galbraith, J. K.)著,
嵇飞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世纪文库)
书名原文: The New Industrial State
ISBN 978-7-208-10790-8

I. ①新… II. ①加… ②嵇… III. ①美国-研究
IV. ①D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31012 号

责任编辑 刘林心
封面装帧 陆智昌

新工业国

[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著
嵇 飞 译

出 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
印 刷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965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4
字 数 373 000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790-8 / F · 2110
定 价 56.00 元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2012年出版)

一、世纪文库

- 《中国南洋交通史》 冯承钧 撰 谢方 导读
《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 陈子展 撰 徐志啸 导读
《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附补编)》 蔡尚思 撰 李妙根 导读
《书林清话》 叶德辉 撰
《中国修辞学》 杨树达 著
《中国文字学概要·文字形义学》 杨树达 著
《中国民族史·中国民族演进史》 吕思勉 著
《中国封建社会》 瞿同祖 著
《神话与诗》 闻一多 著
《汉语方言地理学》 [比利时]贺登崧 著 石汝杰 [日]岩田礼 译
《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 范行准 著 牛亚华 校订
《论自由》 [英]约翰·穆勒 著 徐大建 译
《人类与大地母亲——一部叙事体世界历史》 [英]阿诺德·汤因比 著 徐波等 译 马小军 校
《新工业国》 [美]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 著 嵇飞 译
《实用人类学》 [德]康德 著 邓晓芒 译
《道德形而上学原理》 [德]康德 著 苗力田 译
《神话研究(上)》 [德]汉斯·布鲁门伯格 著 胡继华 译
《人的行动》 [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著 余晖 译

二、袖珍经典

三、世纪前沿

-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美]小威廉·休厄尔 著 朱联璧 费滢 译
《政权与斗争剧目》 [美]查尔斯·蒂利 著 胡位钧 译
《大革命与现代文明》 [以]S.N.艾森斯塔德 著 刘圣中 译
《复杂适应系统——社会生活计算模型导论》 [美]约翰·米勒 斯科特·佩奇 著 隆云滔 译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 [美]查尔斯·蒂利 著 魏洪钟 译
《权力的批判——批判社会理论反思的几个阶段》 [德]阿克塞尔·霍耐特 著 童建挺 译
《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 [美]戴维·斯沃茨 著 陶东风 译

四、大学经典

- 《白香词谱》 [清]舒梦兰 撰 丁如明 注评
《孙子兵法》 [春秋]孙武 撰 [三国]曹操 注 郭化若 校笺
《白话本国史》 吕思勉 著

五、开放人文

(一) 插图本人文作品

(二) 人物

(三) 插图本外国文学名著

新工业国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 昕

委员

丁荣生	王一方	王为松	毛文涛	王兴康	包南麟
叶 路	何元龙	张文杰	张英光	张晓敏	张跃进
李伟国	李远涛	李梦生	陈 和	陈 昕	郁椿德
金良年	施宏俊	胡大卫	赵月瑟	赵昌平	翁经义
郭志坤	曹维劲	渠敬东	韩卫东	彭卫国	潘 涛

出版说明

自中西文明发生碰撞以来，百余年的中国现代文化建设即无可避免地担负起双重使命。梳理和探究西方文明的根源及脉络，已成为我们理解并提升自身要义的借镜，整理和传承中国文明的传统，更是我们实现并弘扬自身价值的根本。此二者的交汇，乃是塑造现代中国之精神品格的必由进路。世纪出版集团倾力编辑世纪人文系列丛书之宗旨亦在于此。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包涵“世纪文库”、“世纪前沿”、“袖珍经典”、“大学经典”及“开放人文”五个界面，各成系列，相得益彰。

“厘清西方思想脉络，更新中国学术传统”，为“世纪文库”之编辑指针。文库分为中西两大书系。中学书系由清末民初开始，全面整理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术著作，以期为今人反思现代中国的社会和精神处境铺建思考的进阶；西学书系旨在从西方文明的整体进程出发，系统译介自古希腊罗马以降的经典文献，借此展现西方思想传统的生发流变过程，从而为我们返回现代中国之核心问题奠定坚实的文本基础。与之呼应，“世纪前沿”着重关注二战以来全球范围内学术思想的重要论题与最新进展，展示各学科领域的新近成果和当代文化思潮演化的各种向度。“袖珍经典”则以相对简约的形式，收录名家大师们在体裁和风格上独具特色的经典作品，阐幽发微，意趣兼得。

遵循现代人文教育和公民教育的理念，秉承“通达民情，化育人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精神，“大学经典”依据中西文明传统的知识谱系及其价值内涵，将人类历史上具有人文内涵的经典作品编辑成为大学教育的基础读本，应时代所需，顺时势所趋，为塑造现代中国人的人文素养、公民意识和国家精神倾力尽心。“开放人文”旨在提供全景式的人文阅读平台，从文学、历史、艺术、科学等多个面向调动读者的阅读愉悦，寓学于乐，寓乐于心，为广大读者陶冶心性，培植情操。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大学》）。温古知今，止于至善，是人类得以理解生命价值的人文情怀，亦是文明得以传承和发展的精神契机。欲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先培育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由此，我们深知现代中国出版人的职责所在，以我之不懈努力，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世纪人文系列丛书编辑委员会
2005年1月

新 工 业 国

前 言

《新工业国》是我父亲的伟大理论著作。《新工业国》首次出版于1967年，即《富裕社会》一书大获成功之后近十年，它超越了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超越了马克思，也超越了凯恩斯——成为完全并行于以及彻底取代新古典思想的思想。在这本书中，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形成了一种洞见，即对厂商作为组织的洞见，以及对于组织——它们结合在一起构成了“计划体系”（planning system）——的经济学洞见。

组织的经济学是相对于市场的经济学而言的。按照加尔布雷思所称的“众所接受的顺序”（accepted sequence），消费者偏好是第一位的。企业把它们的产品置于有辨别能力的公众面前，卖出能够卖掉的，剩下的打折出售，然后研究下一次如何才能做得更好。而按照他自己的“修订之后的顺序”（revised sequence），大企业以新产品的设计和技术作为起点。它们了解什么是可能的，它们进行“市场调研”，它们决定什么是它们所想要的。然后它们开展广告宣传和消费信贷工作，以此保证上面一系列措施的最终产品能够卖得出去。

对于加尔布雷思来说，这是现实；对此，他并不反对。复杂的技术要求市场必须受到控制。除非提前很长时间，而且还要整合由工程技术人才所组成的庞大网络，否则，定义了现代生活的那些产品——汽车、喷气飞机、电力、微型芯片和有线电视——就无法生产出来。这需要计划。计划有时会出现错误，有时一家公司必须大胆涉足未知的领域。不过，并非经常如此。

大型厂商往往甚至完全取代了市场。它们是通过整合做到这一点的：或者以公司内部的行为，或者以大规模、稳定的企业与其小规模、专业化的供应商之间的行为，取代此前以公开购销为媒介的行为，而这

样做风险便转嫁到了后者身上。人们既不是通过洞察力（“远见卓识”），也非通过自信满满地运用概率论（“分散投资”）来降低风险的。他们之所以做到了这一点，靠的是组成结构化的团体，大到足以为他们自己塑造未来。在政治学里，这些团体是国家和政党；在经济学中，则是公司。

加尔布雷思写道，一旦控制权转移到组织，这种转移就是完全的转移；为描述小企业以及它的所有者兼企业家而形成的经济学就变得过时了。那种形式的经济学所赞美的是理性的最大化行为，这种行为由找出前往既定目的地的最短路线所构成。但组织是没有目的地的。它们有成员、参与者、利益攸关者，所有这些人都有各异的天赋、利益和目的。决策由委员会做出；位于顶层的那些人的领导能力受到了需要获得下属赞同的制约。作为传统经济学核心本身的个人，不再是非常重要了。企业中的权力归属于加尔布雷思所称的“技术专家阶层”（technostructure）。

与所有的人类实体一样，技术专家阶层主要是为了它自己而运转。组织的生存是第一位的，让企业经营下去是需要一直加以关注的问题，对此委员会的全体成员（通常）都会赞同。除此而外，很多事情都是有可能的；总的来说，每一项核心利益的最低条件都必须得到满足，这意味着将不会去实现每一个人的最大利益。组织是妥协的产物，为谁服务取决于谁拥有话语权。

尤其来说，技术专家阶层并非仅仅是为了将利润让给公司在法律上的所有者——那些持有公司股票的人——而将利润最大化的。他们不拥有话语权，他们的要求因此不太可能被接受。换一种说法，“我们必须这样想象：一个具有充沛的、旺盛的、强烈的异性恋倾向的男人，为了使那些他仅有耳闻的其他男人的机会最大化，竟会躲避他身边的那些近在咫尺、唾手可得的可爱女人”。^[1]若干年后，当主流经济学家们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时，他们称其为“委托-代理问题”。

组织之间进行着相互作用。《新工业国》一书的很多地方是在描

写公司是如何建立的，它们如何发展以及保持员工对它们的忠诚，它们如何做出计划，还有它们如何与竞争对手进行协调和竞争。它们首先是以价格的协调来做到这一点的。我的父亲一开始是作为(二战时期政府的)一名定价官员而声名卓著的，关于价格，他理解一个伟大的真理：当价格已经受到了操控时，操控价格是容易做到的。

如果产品是标准化的而且定价是公开进行的话，那么寡头垄断轻易地就操控着价格，有时会爆发价格战，但这可能会带来破坏性的后果，因此它们极少发生。偶尔，技术上的多样性和产品的复杂性导致操控价格变得较难做到，但只有在这时我们才能观察到对于规律的违反：

因此，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早期，由于串通一气操纵重型电气设备的价格，通用电气、西屋电气(Westinghouse)、阿里斯-查尔默斯(Allis-Chalmers)、英格索-兰德(Ingersoll-Rand)以及其他几家电气设备制造商遭到了起诉。这些公司当中，有几家的几名高管人员被投进大狱里呆了很短的几天，而鉴于以往所有的经验，人们相当正确地认为，不管这些人犯了什么法，这样的高管人员是不会遭受这样的命运的……这些高管们所犯的错误并不在于操纵了价格，而是在于从事了这样的一类业务，这类业务中的价格操纵是极其困难的。电动马达和家用电器的价格受到的是同样的调控，但对于这些产品来说，其价格不需要串通一气就能进行操纵。[2]

计划体系和技术专家阶层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确定价格这么一个相当简单的问题。企业左右着消费者对于它们所设计和销售的产品“具体需求”，它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的、尽管并非完美无缺的成功。(致力于消费者自主权的经济学家对这个观点感到震惊，但加尔布雷思却持宽容的态度。在民众富裕而所涉及的商品又并不重要的情况下，操控消费者的喜好并不是最为严重的社会痼疾。)在与国家打交道时，尤其是在尖端武器方面，技术专家阶层找到了一个理想的伙伴：稳定的客

户、长期的关系、亏损由其买单。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计划体系围绕着经济增长这个神圣的目标达成了政治上的共识：总需求的稳定扩大意味着商业企业将有不错的盈利和光明的前途。增长首先服务的是组织，其他的客户都要排在它后面。

计划体系向现代高等教育灌输着它所特有的品位，它强调的是一般性的商业艺术，贬低高等技能(科学、数学、工程学)以及诸如设计、音乐、工艺和艺术这样一些较为古老的才能的重要性。这些东西今天我们靠的是进口。加尔布雷思解释了这一现象：技术专家阶层一般来说并不需要工匠。它需要的是愿意按照组织的目标和习惯被塑造，愿意做组织所要求的任何事情的听任摆布的年轻男女。在这方面，公司类似于政府的涉外部门和军队，而完全不像中世纪的行会。与近期劳动经济学中一个普遍接受的观点相反，教育并不传授技能，它所传授的是逆来顺受。

加尔布雷思在一定程度上是崇拜卡尔·马克思的，但他的作品超越了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学说。在普遍富裕的国度里，阶级冲突注定会减少。在计划取得了成功的地方，甚至普通的工人都会认同企业的目标；工会因而失去了它们的先锋地位。所有这些都表明，表达异议需要采取新的形式，以社会均衡问题——私人生活的富裕和公共领域的贫穷——以及与此相关的环境、审美和文化方面的担忧作为着重点。这就是加尔布雷思的方向。可以公平地说，“老左派”在大部分时候并没有追随着他。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崇拜加尔布雷思，甚至以他作为他们的偶像。但大部分人从来都没有从简单地要求“更多”中摆脱出来；直到今天，有组织的劳工运动、民主党和独立左派中的领袖人物们仍然坚持认为，在这个地球上最富有的国家里，工人的主要问题是他们的所得并不“足够”。可能在许多时候，当工人们希望获得质量像样的教育、支付得起的医疗保健和稳定的收入时，他们比为他们说话的那些人更加是加尔布雷思主义者。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坚信，为了达成充分就业，就必须对总需求

进行管理。而一旦实现了充分就业，他认为针对自由市场体系的古典经济学可能会自圆其说。加尔布雷思并不抱有这样的幻想。两人之间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尽管凯恩斯几乎忽视了技术上的变革，但加尔布雷思（他对此见得较多）却理解其本质的东西。故而加尔布雷思意识到，某种形式的计划体系是这种场合的一个永恒特征。在这方面，加尔布雷思与正统思想的决裂比凯恩斯更加彻底。

《新工业国》出版之时，美国的凯恩斯主义正处于其巅峰时期，其影响力下滑的日子仍未到来。不过，在凯恩斯学说影响力的上升之中，加尔布雷思看到这些学说遭到了凯恩斯追随者们的扭曲。计划体系出于它自己的目的对需求管理进行了整编。正如已经指出的，增长而不是充分就业现在成为了至高无上的政策目标。增长的波动立即就会受到公共政策的关注，失业率的增加则不会，除非是威胁到体系的政治稳定。计划体系谋求推动增长刚好快到足以确保其所代表的各家企业的稳定增长，但又不会快到会恢复工会的力量，或者也可以说是其已经丧失的好斗性。减税所促成的增长因此可能会导致接近于充分就业，但却永远不可能实现充分的就业。

40年后，针对《新工业国》所提出的主要指责，是它没有预见到美国的商业在自1970年起的几十年时间里所遭受的沉重打击。这种重创出现在四个阶段。首先是来自日本的挑战，尤其是在汽车和钢铁行业。然后是20世纪80年代的产业崩盘。90年代出现了技术泡沫，（据称）这重新确立了以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为典型的所有者兼资本家的控制地位。最后是各种公司丑闻，涉及诸如安然(Enron)、泰科(Tyco)和世通(WorldCom)这样一些公司当中的巨人。

说一本书没有预测到未来是很容易就能做出的批评。因为马克思相信革命会在所有地方都能取得胜利，而当时并没有如此，所以往往有人认为马克思并不伟大。加尔布雷思是在美国公司处于权力巅峰时对其展开论述的，在那个时候，批判他的那些人对公司权力的存在视而不见。然后他们又嘲笑他没有能预测到具体企业的衰落——似乎这样的

衰落就证明了公司的权力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一样。在我父亲这一边，他在继续前行，并没有对此进行有力的反驳，而《新工业国》也淡出了人们的视线。这是一件可耻的事情，因为尽管他这本书的见解所针对的是当时存在着的那个计划体系，但这些见解对后来出现的那些转型、危机、衰落和复兴有着完美的阐述。

20世纪70年代后期来自日本的挑战并没有证明竞争性市场是通行的规则。相反，这一挑战源自一个计划体系对另一个计划体系的势力范围的侵入。日本人有计划体系吗？他们当然有：在因美国的占领而建立起来的体系之中——加尔布雷思本人在其早期也在其中起到了作用——他们的这个计划体系结合了这个国家传统的政府和“企业组织”（公司网络）之间的联盟。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日本的计划体系不断增长，它先是追随着美国的计划体系，直到强大到足以在美国制造商的本土势力范围内挑战它们。

美国人又是如何应对这一挑战的呢？是以政治方式做到的，采用的是由罗纳德·里根的那些自我标榜为自由市场人士所推行的“自愿出口限制”——颇具讽刺意味。我们应该对里根的手下给予表扬。他们没有让美国面对自由市场竞争，因为这会给美国的商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相反，他们在与日本人的新一轮讨价还价中占据了上风，允许后者缓慢地扩大市场份额和进行产品升级。这样做的结果是美国企业有管理的失败，这不是一件好事情，但却远远好于没有管理的失败。

《新工业国》确实没有预见到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那种大范围的产业崩盘。迟至1978年的本书第三版之中，加尔布雷思仍然认为，金融部门定量分配资本——因而决定工业和商贸企业哪些生存哪些死亡——的传统权力正在遭到削弱。这个观点在当时是正确的。直到一年后保罗·沃尔克(Paul A. Volcker)登上美联储主席之位以前，没有人知道，就我们所知，甚至连大部分的银行人士也都是如此，高端金融的势力正在准备一场大规模的反击。而沃尔克也是在罗纳德·里根1981年执政之后才发动那场利率20%的世界末日决战的。

里根和沃尔克着手将世界恢复到“新政”之前——工会出现之前，对抗性力量出现之前，还有最重要的，计划体系出现之前——所存在着的那个世界。要让市场——具体而言，资本市场——进行统治。高利率会从经营不充分的厂商之中选出那些擅长经营者。银行家会借贷给最好的企业，挤压其余的企业，并且迫使生存下来的企业向较高的劳动生产率标准看齐。加尔布雷思认为这完全是不切实际的想法。银行家们是强大有力的，但却不适合起支配作用。现代的银行人士远非放大版的小镇上慈父般的地方商机专家，他们横跨公司和政治两个世界，但却对这两者都所知不多。尤其是他们无法理解作为大公司核心的技术工作，因此他们无法对公司的战略或者业绩实施实际的控制。银行家的权力主要是破坏性的：他能挤压企业，他能破坏企业——但要在一片废墟之上建立一个较好的企业，这样的奇迹却不会发生。

在真实利率超过了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经济增长率的情况下，正常的商业经营活动遭到了破坏。因此，正如我们完全可以预料到的那样，公司金融治理的规则垮掉了。如果规定了不可能的条件，又没有加以确认的手段，那么人们就会作假，这是人类心理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企业会做假账，然后会受到市场的奖励——而且肯定不会受到市场的惩罚，这不仅巩固了它们的地位，而且损害了诚实竞争者的地位。只是在后来，这些欺骗行径才会被发现。高利率的时代会以公司和银行业陷入灾难收场，这原本应该是件容易预测的事情。在20世纪80年代的早期，当这些政策正在形成之时，加尔布雷思确实预见到了这个结果；在这之前几年，《新工业国》之所以没有预见到这一点，这是因为它乐观地坚信，没有一个政府会疯狂到把利率提到如此之高。

里根和沃尔克所采用的这些方法造成了债务危机，在长达20年的时间对整个世界都造成了影响，它们还导致了美国国土的中心地带出现了大规模的去工业化。一直存在到1980年的那种计划体系大体就此屈服。但并非彻底如此，20世纪90年代经济最终恢复之时，随之出现的仍然是一个计划体系。只不过它的形态不同了，而且权力平衡关系

也发生了改变：投资银行家和金融掠夺者重新得势了，因而它也就不如 60 年代的时候那样稳定。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大型工业企业遭到了削弱，而且至少对于有些人而言，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即人们可以在工业之外拥有更加美好的未来。金融业在向那些掠夺成性者招手。稍后一些，技术行业召唤着那些具有超常想象力、技术天赋或者机械奇才的人，或者是有能力说服风险资本相信某人具备这些特征的人。技术专家阶层中尤其是与电子计算机有关的那些部分从大型工业企业之中分离了出去。与比如说风洞之类的东西不同，微处理器和软件在许多领域都有广泛的应用。如果生产并不维系于任何特定的终端产品，比如说电脑主机，那么它们的潜力就更大一些；而如果它们能够摆脱大公司在工会强大和资本廉价之时形成的债务、养老金以及诸如此类的负担，那么它们的盈利能力就会大得多。

因此就出现了技术繁荣：新型的、由风险资本提供融资的企业大量涌现，服务于全世界的芯片和软件市场。而随着这次繁荣的到来，也就出现了针对加尔布雷思有关技术变革的远见的新一轮攻击。工程师和组织人员真的重要吗？现在不是出现了那种最古老、最为人所称颂的经济原型——坚忍不拔的独立企业家——的新品种了吗？换句话说，如何解释比尔·盖茨的出现？

但是，对于比尔·盖茨的出现，我们有着加尔布雷思主义的解释。微软需要进行市场营销。它需要显得很“酷”。年轻的天才怪杰这样一个形象满足了微软这个组织的目的。超级明星的神话有助于扮靓这样的一家企业：它的成功首先取决于（与 IBM 之间）排他的特许经营权（微软为其早期的个人电脑提供操作系统），取决于专利保护，后来又部分地取决于饱受质疑的对于市场权力的操纵。后来，盖茨个人的财富开始彰显着微软的实力；再后来，他创办的基金会在全世界各地大办善事，以此帮助他改善和恢复他的名声。所有这些都曾经而且仍然有着商业上的用途。对于微软而言，它的首席执行官一直都是首席商人，